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纂及其意义

张登德, 苏雪梅

(山东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014)

摘要:新中国成立后, 为了服务大规模经济文化建设与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 在党和国家各部门积极配合下, 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主, 各相关院所及个人开展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出版工作。20世纪五六十年代, 各编写组克服困难, 先后完成“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资料”等经济史资料的选编工作, 成果显著。这批资料的整理、出版, 不仅在当时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 而且, 在历经半个多世纪后的今天, 其使用价值仍不减当年, 被国内外学者从事相关研究时反复运用, 意义深远。

关键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经济史资料;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图分类号: K2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1217 (2026) 02-0107-10

收稿日期: 2025-12-31

作者简介: 张登德(1973-), 男, 山东潍坊人,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 历史学博士, 博士生导师;
苏雪梅(2001-), 女, 山东德州人,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

DOI:10.16284/j.cnki.cn37-1401/c.2026.02.005

20世纪五六十年代, 我国在进行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过程中, 曾经组织大批经济史学家整理旧中国遗留下来的丰富史料。各编辑委员会分工合作, 整理、出版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等多种经济史资料。目前, 学界在考察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时, 曾对这一时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进行简单综述^①, 而对这些资料的编写缘起、过程以及出版后的反响等, 缺乏系统梳理和分析。据《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书中统计, 1949—1966年间, 我国公开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 27 种 53 本; 虞和平在总结 50 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时说, 这 17 年中出版资料 38 种。据笔者统计, 在这 17 年中整理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 40 种 60 本。这些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 虽然存在各种问题, 但是对于促进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建设、建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话语体系等领域, 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与现实意义。

一、编写缘起

新中国成立之初, 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正值起步之际,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资料的整理工作。中国史学会组织当时国内历史学者编纂一部关于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大型资料汇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 其中 10 部在 1951 至 1958 年出版。经济学家既重视现实问题的研究, 也从事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工作。在多重因素促使下, 以严中平、汪敬虞、千家驹为代表的经济史学者纷纷投身于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和编纂工作。

(一) 党和国家的大力支持

新中国成立前后, 毛主席与周总理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予以高度关切。1941 年, 毛主席在延安干部会议上提到“近百年的经济史, 近百年的政治史, 近百年的军事史, 近百年的文化史, 简直还没有人认真动手去研究”, 所以“对于近百年的中国史, 应聚集人材, 分工合作地去做, 克服无组织的状态。应先作

^① 宓汝成、邢菁子编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 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 1989 年;郑起东等:《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19 年;虞和平:《50 年来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 《近代史研究》1999 年第 5 期, 等等。

经济史、政治史、军事史、文化史几个部门的分析的研究,然后才有可能作综合的研究”^①,后面这段话被“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印于正文之前。据此可以看出“毛主席在号召我们对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等问题进行研究的时候,经常是把‘经济’列为首位的”^②。1956年1月,周总理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提出“向科学进军”的号召,鼓励知识分子开展科学研究。因当时开展史学研究面临史料匮乏的问题,1959年周总理在《把知识和经验留给后代》讲话中强调:“新中国成立以前的史料很值得收集。时间过得很快,开国至今已经10年了,如果不抓紧,有些史料就收集不到了”^③。可见,党和国家领导人重视中国近代历史的研究,以及相关档案、史料的整理工作。

1953年,党中央决定成立中国历史问题研究委员会;次年秋,委员会召开第二次会议时,为促进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决定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现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辑近代中国经济史资料。^④1955年,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副主任潘梓年在学部成立大会的报告中讲道:“搜集和整理各种资料,是进行研究工作的必要条件。过去对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很不够,今后对搜集与整理学术资料的工作应该加强。”^⑤1958年4月,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经济组召集座谈会,由中国科学院经济所所长孙冶方主持讨论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辑工作,出席这次座谈会的有研究机关、高校、国家档案局、人民出版社等27个单位的39人。会议提出《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辑工作规划(草案)》,共有39项资料整理项目,包括财政、金融、盐务、赋税、企业、工人生活、对外贸易、交通、海关、物价等。^⑥可见,在毛主席、周总理的敦促下,各部门积极开展讨论,并最终确立相应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纂计划予以施行。

(二) 服务于现实经济建设与教学和研究的需要

随着新中国经济建设的推进,因缺乏相应人才,国家强调高校要开展科学研究。《光明日报》社论中更是指出,“学校大搞科学研究,大搞尖端,这是一项根本方针。”^⑦同时,各高校在开设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时,缺乏经济史资料以供教学使用。据统计,由于新中国成立前“公文档案非一般人所能看到,即使文集、奏议这类资料,因多系私人刻版刊印,印数极少,流传不广”^⑧,1925年至1949年的20多年间,除在《文献丛刊》《史料旬刊》等刊载部分近代史资料外,整理出版的近代史料专集只有《筹办夷务始末》《清光绪朝中日交涉史料》等七八种。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中许多热点问题展开争论,组织整理相关资料也是为研究工作打好基础。严中平强调史料整理工作的重要性:“一向阻碍中国近代经济史科学研究工作迅速前进的一个严重的障碍是史料的庞杂、分散,流传不广,和未经整理的原始状态。”^⑨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搜集中国近百年金融史料,即出于“研究近代经济史和中国资本主义经济,对于这一个旧中国早期发生的信用机构的历史资料,自有加以整理汇编的必要”^⑩。同时,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纂也是为其他部门开展研究提供便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因多年来“各工作部门、生产单位、研究机关向我所索取该项资料者极多”^⑪,搜集了很多天津地区的统计资料。所以,严中平明确表示,要“为科学工作者、高等院校师生和中上级财经干部系统地编纂近百年中国国民经济各部门发展史的参考资料”^⑫,即整理、编写这批资料希望有助于当时的教学与学术研究工作。

①《毛泽东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798、802页。

②严中平:《建议与批评:努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科学通报》1956年第7期。

③当代中国研究所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编年(1959年卷)》,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11年,第284页。

④刘大年:《〈历史研究〉的创刊与“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历史研究》1986年第4期。

⑤王忠俊:《中国科学院史事汇编(1955年)》,中国科学院院史文物资料征集委员会办公室,1995年,第142页。

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辑工作的规划》,《经济研究》1958年第5期。

⑦转引张志辉:《科技“大跃进”资料选(1958—1961)》(上),济南:山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50页。

⑧曾业英:《五十年来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上海:上海书店,2000年,第685页。

⑨严中平:《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的几点感想》,《经济研究》1959年第10期。

⑩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编:《上海钱庄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0年,序言第1页。

⑪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指数资料汇编(1913—1952年)》,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58年,前言第2页。

⑫严中平:《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经济研究》,1956年第4期。

时年,学界为了解近代经济问题,很多需要从历史资料整理出发。南开大学编著《启新洋灰公司史料》之时说道:“要了解中国民族资本的今天,必须了解中国民族资本的昨天,因此,我们决定从史的角度,对中国大型民族工业企业进行典型调查。”^①1957年,部分资产阶级右派分子抓住个别商品价格作合理调整的例子,试图挑拨广大人民和共产党、人民政府的关系。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与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所整理物价资料汇编“请他们睁开眼睛来看看铁的历史事实吧!”^②许多资本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国家的代表团访华时非常关心我国如何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问题,千家驹提出“总结我国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平改造的经验,提高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水平,不仅可以丰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内容,而且还有革命的国际意义”^③,整理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资料以为世界所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纂亦是希望有助于解决新中国涌现出的现实经济问题。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开展经济史学研究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得以整理出版,与当时史学界“厚今薄古”之风也有关系。范文澜即评价史学工作者,应“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研究中国历史”,首先便要“和我们最密切以及较密切的实际联系起来”^④。陈垣亦曾说:“过去的历史虽然时间长,内容丰富,但是几千年的历史都是人民受剥削受压迫的历史,人民的思想智慧一直是受压抑的,所以真正内容最丰富的历史还是现在。”^⑤在此学术氛围影响下,《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编写组表达了希望成书“在提倡厚今薄古的时代,能对现代中国经济史的研究有微小的贡献”^⑥。正因研究重心倾斜近现代史,故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国近代经济史才能聚集大批优秀学者开展资料编辑工作。

新中国成立初期编纂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不乏出于国家树立反帝反封建意识形态的需求。“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在编写过程中尤为体现反帝思想。编者认为海关档案“并不单纯是有关海关税收、税务行政的记录,而主要是帝国主义分子如何策划、密谋以及贯彻执行帝国主义的殖民政策,以使我国沦为殖民地、半殖民地的铁证”^⑦,整理相关资料是为了使读者看清帝国主义侵略的丑恶嘴脸。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成立初期就把唯物史观作为史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列入新民主主义文化事业建设的重要议题。^⑧同时,史学研究存在“以俄为师”现象,亦是资料编纂工作得以开展的推动力之一。1952年,中国科学院组织代表团访问苏联,出版编译局副局长刘大年便是其中一员。他在总结此次出访时,提到“努力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努力掌握大量的历史资料,就是苏联史学家在工作方法上的基本经验”^⑨。在唯物主义史学影响下,千家驹“对于旧中国发行的内债试图从马克思列宁主义观点作历史的全面的研究与分析”^⑩。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则在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统计学后,认为“以前编制的各种指数,无论从计算公式、物品选择、指数分类、权数、以及物价调查等方面看来,都是采用资产阶级的一套编制方法”^⑪,需要修改。因此,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引领下,我国经济史学家先后开展新一轮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纂和研究工作。

(四) 旧中国出版的经济史著作有不足之处

①《启新洋灰公司史料》,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编辑说明第1页。

②《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1921—1957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前言第2页。

③千家驹:《关于整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④范文澜,陈垣,侯外庐等:《研究历史应当厚今薄古》,《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⑤范文澜,陈垣,侯外庐等:《研究历史应当厚今薄古》,《历史研究》1958年第5期。

⑥《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序言第14页。

⑦《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前言第2页。

⑧叶建:《新中国成立初期唯物史观史学话语的阐扬与确立——论三联书店历史类学术图书重印、增订与新版的历史价值》,《出版科学》2023年第1期。

⑨《学习苏联先进科学》,北京:中国科学院,1954年,第421—422页。

⑩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内容提要。

⑪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南开指数资料汇编(1913—1952年)》,北京:统计出版社,1958年,前言第1页。

新中国成立后,学术界对部分出版于旧中国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评价较低。例如,汪敬虞评价巫宝三的《中国国民所得:一九三三年》(中华书局1947年版)在概念和理论上“并未越出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雷池一步,只是为了更好地更忠实地服务于旧中国的内外反动统治势力”^①。同时,“帝国主义与海关”编委会认为美国人马士编的《中华帝国国际关系史》意图“站在侵略者立场替帝国主义侵略中国进行辩护”^②。因此,新中国史学工作者“尽一切努力,大量地收集资料、仔细地鉴别资料,为科学研究工作提供详尽的考订真相的原料,就完全必要了”^③。

另外,新中国成立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工作进展较为缓慢,即使已出版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著作内容亦多残缺不全,需进一步整理。《中国埠际贸易统计》的编撰原因之一便是相关统计数据“除海关刊有简略的记录外,至今还没有一部完整的资料出版”^④,而按年发表的“国内贸易土货转口统计”存在货物来去不明、分类不清等问题。同时,资料整理也是为了方便研究者查阅。《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一书运用的部分资料虽在海关十年贸易报告和海关贸易年报中都发表过,但“这些书目一般读者已不容易获得”^⑤,编者即选择有关的重要部分予以发表。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初期,经济史学界对民国时期经济史著作展开系统性反思:一方面批判旧有成果的意识形态倾向,另一方面针对原始资料散佚、统计数据混乱等问题,决意开展新的经济史资料规范化整理工作。

二、编纂概况

学界在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纂工作过程中面临着很大挑战。新中国成立前,很少高校专设中国近代经济史课程。据宓汝成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专业从事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者寥寥可数,也许只有一、二十人”^⑥;严中平则说,至1956年,“从事中国经济史教学或研究工作的副教授、副研究员以上的人员,全国不足40人”^⑦。以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为主的科研、教学和国家行政机构人员迎难而上,先后成立多个编辑委员会,在其他相关部门与出版社的积极配合下,完成了多种经济史资料的编纂任务。

(一) 编纂队伍

1956年,严中平曾说:“今天应该是我们努力实现十五年前毛主席号召的时候了。我们‘应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克服无组织的状态’。”^⑧实际上,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自1953年设立经济史组,便聚集了众多著名的经济史学家,为当年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纂的重镇之一。其中,有海外经历的郑友揆与熟悉统计业务的韩启桐,参与了“中国科学院社会研究所丛刊”的编写。随后,经济所主导、严中平负责的“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选编工作,编委会中即有所内人员:汪敬虞、李文治、章有义、姚贤镐、徐义生、宓汝成、彭泽益等,其主要编者严中平与孙毓棠还同时参与了“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的编纂。中国史学会和中国经济学会联合组织“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由11位同志组成,其中“以陈翰笙、范文澜、千家驹三人为主要负责人,由千家驹负责领导”^⑨,主要人员来自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此编委会中另有兼任财政经济出版社公方代表的狄超白,兼任《经济研究》编委会委员的巫宝三,曾任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调查研究处处长的吴承明和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第三所的丁名楠,北京大学经济系代理

①汪敬虞等:《批判资产阶级经济学者对中国国民收入的“研究”》,《经济研究》1958年第1期。

②《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引言第1页。

③严中平:《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经济研究》1956年第4期。

④郑友揆、韩启桐编:《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北京:中国科学院出版社,1951年,说明第1页。

⑤《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编辑说明第3-4页。

⑥宓汝成、邢菁子编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9页。

⑦严中平:《建议与批评:努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科学通报》1956年第7期。

⑧严中平:《建议与批评:努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科学通报》1956年第7期。

⑨《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前言第1页。

主任陈振汉和北京农业大学农业经济系教授王毓瑚,等。除此之外,1953年1月,政务院决定,海关总署划归外贸部领导,将外贸部的对外贸易管理总局与海关总署合并,改称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委会与对外贸易部海关总署研究室合作编译了“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从1957年至1965年共出版有10辑资料书。

除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之外,地方院所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整理工作中也发挥了重要作用。1956年,中国科学院党组就拟建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体制问题提出建议,认为“没有必要把所有拟建研究机构都集中在科学院,可分为三类情况处理。第一类,是少数能解决哲学、社会科学中主要理论问题的研究所,一两年内设立的有10个”^①,其中之一即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1958年9月,其划归上海社会科学院,成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该所“为了配合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用解剖麻雀的方法,对上海的一些典型企业作了一系列调查”^②,组织编写了一批企业史资料,称为“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史料”。另外,《上海解放前后物价资料汇编》一书虽不属于这套丛书,但同为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成,也算其整理成果。

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后,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制定了编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的计划,1960年开始着手。这套丛书,“由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中央工商行政管理局的资本主义经济改造研究室主编(后改为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主编),每种由上海市工商行政管理局会同有关的某一(如棉纺织、橡胶)工业公司合组史料工作组编辑而成”^③。此外,上海市文物保管委员会、中国人民银行总参事室金融史料组和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市分行等机构在此时期也分别编纂了相关领域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

不仅各科研院所看重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各高校也逐渐开设国民经济史课程来培养专业人才。1953年高等教育部规定,“中国近代经济史为高等院校经济系和财经各专业的专业基础课,列为必修课”^④。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曾于1927年聘请耶鲁大学毕业归来的何廉留校任教,并批准其“创办南开大学社会经济研究委员会,即今天的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⑤。新中国成立后该所将以前编著的《南开指数专刊》汇集出版,并与南开大学经济系出版了关于中国创设最早的一家水泥厂——启新洋灰公司的相关史料。南开大学历史系则从《大清历朝实录》中选出经济史部分资料汇编成《清实录经济资料辑要》(中华书局1959年版)。中国人民大学国民经济教研室编《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参考资料:文献和统计资料》,1962年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

此外,在发掘、整理经济史资料的过程中,并不排斥个人编写。三联书店出版了陈真、姚洛、逢先知合编的《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此书与中国科学院经济所编辑的工业史资料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展开论述,“经济所编辑的一种,是按部门同时又按历史发展顺序来编辑的;陈、姚、逢所编之书则按中国近代工业史的某些主要问题来编辑的”^⑥,两书共同反映了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和发展的迂回曲折过程。滕茂桐在新中国成立后担任南开大学教授,在他受到不公平批判之时,改用笔名吴冈出版《旧中国通货膨胀史料》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巫宝三、冯泽、吴朝林合编《中国近代经济思想与经济政策资料选辑(1840—1864)》,于1959年由科学出版社出版。

由此可见,新中国成立之初在编纂经济史资料时,“一时间,名家荟萃,极尽一时之盛。是自一九四九

①樊洪业:《中国科学院编年史(1949—1999)》,上海: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73页。

②《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资料(1984年上半年)》,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4年,第33页。

③宓汝成、邢菁子编著:《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综述》,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209页。

④《经济科学学科辞典》,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1987年,第57页。

⑤陈宗胜,朱琳:《荣耀南开百年,激励中华千秋——简评〈“南开指数”及相关经济资料汇刊〉》,《南开经济研究》2019年第5期。

⑥《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出版情况》,《人民日报》1962年1月6日。

年以来大陆的中国经济史学界精英的第一次集体出场”^①。但当年学者们开展工作的条件并不完备，能组织这些资料整理队伍实属不易。严中平原为巫宝三助手，研究“中国国民所得”，但在“以苏为师”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各个部门行业的资料成为“高度机密”，研究条件业以消失。“其他同仁，也多有类似经历，如徐义生是研究政治学的，后改为研究外债史；孙毓棠原本主要从事中国古代史的研究，这时为了工作需要，也就加入到这一行列中来”^②。编写过程之多艰，更加体现出这批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得以编成弥足珍贵。

（二）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选编概况

正如千家驹所言：“我们的资料固应以解放以后为主，但是历史是不能割裂的，解放前的资料对于研究改造是十分重要的”^③，许多著作在新中国成立前即已着手编写。《中国埠际贸易统计》便是“在抗战期间曾向海关总税务司署调用卷帙浩繁的原始资料，就所得到的1936至1940部分加以编纂”^④，只因出版困难而未能付印；而南开大学经济研究所编制指数的工作则更早开展，始于1928年。

编纂人员在收集、整理经济史资料的过程中，“充分地利用了档案文件和调查访问记录，把死资料和活资料相互校正、相互补充”^⑤，以求在编辑内容上展示真实的历史情况。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在搜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过程中整理了很多口述材料，包括“资本家的回忆录，香港厂和上海厂老工人和老职员的回忆和访问，以及专题的座谈和记录等”^⑥。除此之外，各编委会在成书过程中运用了大量的档案资料。“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各书中即“收集了大量史料，包括文集、奏议、方志、碑刻、同业公会档案、企业文书账册、各种行业调查报告、年鉴、统计资料、海关资料、中外文专著、中外文报刊等”^⑦。同时，部分编纂者在书中补充了大量的英文资料，中西互证，体现新中国成立初期学术氛围上的包容性。例如，彭泽益编《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时即翻阅了大量的英文书刊，宓汝成编的《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更是参考了大量的外文档案、原稿、抄本、报刊、著作等。

在拥有如此多元史料的基础上，这些著作的资料梳理方式也是十分丰富的。首先在资料选用上史料互证，增加了成书内容的真实性。千家驹在整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时便提道：“对于这种活资料，在利用时也要加以分析研究，不可以因为这是第一手资料而完全信任。上海经验证明，资本家供给的资料，他们喜欢多谈光荣史而不愿谈他们丑恶的一面”^⑧。其次，各位编者在论述过程中具备很强的逻辑性。《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中讨论某些民族工业资本如何形成的问题，当时还没有直接的材料可以作正面的回答，汪敬虞便“从各厂创办人或投资者的出身和社会关系”入手，“作一些间接的推测，有助于对这一个问题的了解”^⑨。姚贤镐整理贸易史资料直接指明：“本编资料的编辑，在方法上企图根据历史联系和逻辑联系相结合的原则，将全部资料分为三个时期；在每一时期之内，则按问题的逻辑联系分为先后主从；在同一问题之内，又按问题的发展过程为顺序”^⑩，进而有助于读者发现事情的本质。再者，各编委会在编纂过程中得到了各界人士的积极配合。《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的资料选辑和翻译工作即主要“由上海海关前研究室江辰生等同志和海关总署研究室陈泽宪同志分头进行”^⑪；《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的编成则离不开恒丰纱厂党委、行政、工会、共青团及工人同志们所给予的各种帮助。最后，编者在选编时大都尊重史料

①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重版序言第1页。

②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重版序言第1页。

③ 千家驹：《关于整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④ 《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说明第1页。

⑤ 严中平：《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的几点感想》，《经济研究》1959年第10期。

⑥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编辑说明第2页。

⑦ 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等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年，再版序言第17页。

⑧ 千家驹：《关于整理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资料的几个问题》，《经济研究》1957年第3期。

⑨ 汪敬虞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年）》，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序言第26页。

⑩ 姚贤镐编：《中国近代对外贸易史资料（1840—1895）》，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序言第3-4页。

⑪ 《中国海关与中法战争》，北京：科学出版社，1957年，引言第8页。

原貌,让读者批判使用。

(三)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出版发行

1949年10月3日,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了全国新华书店出版工作会议。毛泽东主席为这次会议题词:“认真作好出版工作”;朱德副主席发表开幕讲话时指出:“过去,出版工作是为革命军事服务,为人民的政治斗争事业服务,现在,全国的生产建设事业开始了,出版工作就更要为生产建设事业而服务。”^①新华书店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编纂过程中最主要的发行机构。而担任出版工作的主要是科学出版社、中华书局、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中国科学院出版编译局为科学出版社之前身。1954年5月,在出版总署的协助和推动下,出版编译局与上海私营龙门联合书局洽商公私合营,决定成立科学出版社,由中国科学院与出版总署共同领导,以中国科学院为主。^②此后,科学出版社在中国科学院手中接下了与中华书局、三联书店合作出版“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的任务。其中,《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孙毓棠《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40—1895)》、汪敬虞《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1895—1914)》,即由科学出版社在1955、1957年出版。1961年之前,科学出版社承担“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的出版工作。随着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部门划归中宣部直接管理和领导,文化部发出《关于将科学出版社担任的哲学、社会科学书刊出版任务转移给其他有关出版社的通知》,“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自1962年起,改由中华书局出版。中华书局亦全权负责“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的出版工作。此后,科学出版社在人文社会科学学术出版领域的活动一度中断。

中华书局与财政经济出版社曾有密切联系。1954年1月,胡愈之署长在“关于中华书局全面公私合营问题”会议上指出:同意将中华书局改组为公私合营的出版社,仍兼营印刷业及海外发行,为了出版书籍的方便并便于应付海外环境,仍保留中华书局牌号,但应加挂“财政经济出版社”牌号,凡财经图书均以“财政经济出版社”名义出版。^③次年,财政经济出版社出版了千家驹编的《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同年11月,财政经济出版社将有关统计书籍的编辑出版业务移交给新成立的统计出版社,统计出版社于1958年出版了《南开指数资料汇编》。

另外,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上海资本主义典型企业资料”丛书,包括《恒丰纱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大隆机器厂的发生发展与改造》《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荣家企业史料(上)》。三联书店则在1951年8月并入人民出版社,1954年中共中央宣传部对三联书店作出指示,要求出版旧社会出版的学术图书,尤其是“关于中国历史的各方面材料的整理和考据的著作”^④,其承担了《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北京瑞蚨祥》等多种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出版工作。此外,神州国光社受“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所托出版了魏子初的《帝国主义与开滦煤矿》。

出版总署不仅下达相关政策指导各大出版机构服务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工作,且一些专业研究人员也加入到各大出版社之中。比如,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代所长狄超白便为财政经济出版社董事会公方代表之一,后担任社长兼总编辑;刘大年作为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副所长,也兼任科学出版社前身出版编译局副局长。经济史学家亲自参与出版工作,更使经济史资料的学术性得以保障。

①袁亮编著:《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陈云与新闻出版》,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2003年,第296页。

②《科学出版60年》,北京:科学出版社,2014年,第3-4页。

③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中华书局百年大事记(1912—2011)》,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第156页。

④《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1954年)》,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9年,第196页。

三、编著评价

20 世纪五六十年代我国组织编写的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正如范文澜评价“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这是近代史资料中的瑰宝”。经济史学家们依据“在理论上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庸俗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在方法上批评其在计算方法和统计材料的处理上的主观随意性”^①的原则开展编纂。但限于现实史料条件与经济建设需求,在地域上更倾向于上海、天津等近代名城,部门选择上则以工、农、商为主,对部分规模较大、历史悠久、且有经济代表性的企业为主体展开研究。时至今日,这些资料仍被中外经济史学界广泛运用。

(一) 积极意义

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纂是新中国成立后史学界一次大规模抢救珍贵史料的过程。汪敬虞在《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再版时评价:“本书是自一九四九年后第一种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方面的工具书”^②,可见此次编纂开创性地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之前各个行业各个部门的统计资料“互不相属、各自为战”的混乱现象。中国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王可风曾说:“这些历史档案,在解放前,曾不断地被销毁,当旧政权崩溃时又遭受到很大的破坏”^③,此次资料整理过程中保存了大量珍贵的经济史资料。《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摘录原始资料的字数便“远超过 150 万字”,且汇编初稿字数“亦有 80 多万字”^④。除了在数字上显现出本次资料整理工作收获巨大,编者们的抢救资料的学术价值也不容小觑。“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所用材料在过去“一直储存在海关的秘密档案室,从未公开发表”,新中国成立后,这批秘密档案回到中国人民手里,经编写组“整理出来并译成中文(原件大部分为英文)”^⑤,才得以公之于众。这些资料编纂,使得大量秘密函电与内部资料能够运用在新中国经济史研究之中,促成更多学术成果的出现。

这些著作在当时乃至今天的中国近代经济史教学与研究中,发挥着重要的参考作用。比如,上海社会科学院整理荣家企业史料即主要是为科学研究提供素材,希望其出版能“对中国近代经济史的研究,尤其是对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研究有所帮助”^⑥。“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即是为了编写《中国近代经济史》而组织整理,而其中摘抄的李鸿章、左宗棠、张之洞等人的文集早已整理出版,《丛刊》编写是综合参阅其他资料进行分析和研究的过程。部分资料在整理过程中,还修正了很多长期以来流传的史实错误。广州市对资改造资料整理研究组发现中国第一个火柴厂是广州的巧明火柴厂而不是重庆的森昌泰,中国火柴工业创建于 1879 年而不是 1889 年,这一成果为《中国民族火柴工业》吸纳。

同时,此次资料整理工作为学者们提供了学术交流的机会。上海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经济史组编写荣家企业史料即由“史惠康、唐传泗、张仲礼、杨荫溥、徐元基、程宁令、黄汉民、徐克礼、凯基、洪明新”^⑦等多位学者聚在一起而合力编成。吴承明^⑧、聂宝璋^⑨、徐义生^⑩等多位经济史学家在著书过程中,将新观点发表在各大刊物上。尤其是《经济研究》常常发表一些资料汇编类文章,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资料整理编纂工作在当时的经济史研究中的重要位置”^⑪。

①郑起东等:《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24 页。

②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 年,重版序言第 1 页。

③王可风:《南京史料整理处对历史档案的搜集整理和利用》,《历史研究》1958 年第 7 期。

④《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 年,编辑说明第 2 页。

⑤《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北京:中华书局,1983 年,前言第 2 页。

⑥《荣家企业史料(1896—1937)》(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编者的话。

⑦《荣家企业史料(1896—1937)》(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62 年,编者的话。

⑧吴承明:《中国资产阶级的产生问题——从影片〈不夜城〉谈起》,《经济研究》1965 年第 9 期。

⑨聂宝璋:《从美商旗昌轮船公司的创办与发展看买办的作用》,《历史研究》1964 年第 2 期。

⑩徐义生:《甲午中日战争前清政府的外债》,《经济研究》1956 年第 5 期。

⑪郑起东等:《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 年,第 32 页。

再者,正如严中平所说:“年青一代完全有可能从这些资料取得初步知识,他们将能在这个基础上更快地成长起来。”^①中国人民大学王方中十分感念在他求学时,能够看到的经济史书籍极其有限,而“《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和《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以及严中平的《中国棉纺织史稿》(1955)、吴承明的《帝国主义在旧中国的投资》(1956)就是我的入门读物”^②。直到今天,《中国近代经济史》^③、《中国近代史》^④等高校教材及《经济科学学科辞典》《中国近代经济史论著选译》等参考书目中仍然能看到这些经济史资料的身影。同时,它们不仅有助于国内史学界开展相关研究,其对大陆之外学者研究中国近代经济史也是意义重大。《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和《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皆被收录于台湾出版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之中。美国学者费正清在《剑桥中华民国史》中评价严中平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收入范围很广的资料,很有价值;其中的资料都有精心的注释——尽管其编排和评注有倾向性,编者对‘指数问题’显然缺乏知识”^⑤。这些著作就像是岁月长河里的“接力棒”,数十年来,在一代代研究者的手中传递,使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工作得以延续。

本次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出版,除学术意义外,还有助于新中国开展的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事业。千家驹研究旧中国发行公债史,论证了新中国公债研究是为了“利用旧的经济范畴来为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服务”^⑥。《中国埠际贸易统计》通过对旧中国物资交流路线和分布状况进行梳理,配合了新中国成立后“扩大物资交流”“做好运销计划”“恢复旧的和建立新的商业网”^⑦等紧要任务。同时,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纂有力地反击了现实经济建设中存在的某些问题,针对“有的人企图把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美化为‘红色资产阶级’”^⑧的现象,《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通过整理史料反映民族资本企业是依靠残酷剥削工人和农民来滋养自身的残酷事实。且直至今天,李文治主编《中国近代农业史资料》中所提及的各方面“仍是近代农业史研究中不可回避的问题”^⑨。

更重要的是,1949年以来,外国出版的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著作对我国相关领域研究产生了冲击。严中平等人作为新中国第一批经济史研究者自有必要“走上国际讲坛,和这些谬论进行面对面的较量,战而胜之,争得那种和我们伟大祖国的崇高声誉相称的国际地位”^⑩。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编著有助于史学界打破旧中国“西方中心论”的学术氛围,进一步树立新中国学术自信。

(二) 不足之处

由于当年能够提供给编纂人员的研究条件有限,所编著作在内容上不免存在某些缺陷。后有学者即指出《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书中的众多数据“在没有计算机这类高速运算工具的条件下,难免会有一些计算上的疏忽”^⑪。施东向则在当年评价中国科学院上海经济研究所编著的两本工厂史“虽然注意了各个时期工人阶级所进行的斗争,但是有关这一部分的材料,以及对这些材料的分析,与其他部分比较,显得无力”^⑫。再者,在编录史料的时候,学者们带有一定的主观性。“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各书中“不可避免有其时代局限,如重视资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侵略、工商业关系、工人阶级斗争等,而技术进步、

① 严中平:《建议与批评:努力开展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的整理、编纂工作》,《科学通报》1956年第7期。

② 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年,再版前言第2页。

③ 赵津主编:《中国近代经济史》,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④ 林增平:《中国近代史》,长沙:湖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

⑤ [美]费正清等:《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刘敬坤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第930页。

⑥ 千家驹编:《旧中国公债史资料(1894—1949)》,北京:财政经济出版社,1955年,代序第1页。

⑦ 郑友揆等编:《中国埠际贸易统计(1936—1940)》,中国科学院,1951年,说明第8页。

⑧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史料》,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序第6页。

⑨ 郑起东等:《当代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9页。

⑩ 严中平:《科学研究方法十讲》,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页。

⑪ 龚缨晏:《关于鸦片战争前中英贸易的几个数据——读〈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9年第1期。

⑫ 施东向:《两本工厂史》,《读书》1959年第7期。

企业制度和管理、工商业与农业关系等内容比较薄弱；有关政府与工商业的关系，偏重政府对工商业的压迫，而对国民政府扶植工商业的一面注意不多等。”^①此外，当年参与编纂的人员之中，有部分仅为初次接触经济史相关工作。“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丛刊”因急于解决中国近代经济史的教学和研究工作“资料饥荒”问题，很多“半路出家”的人，“一面学习经典理论，一面收集资料。我们理论水平之低是不需多说的，就是在资料方面，我们也只查看了某些著作和报刊，搜罗得不够广泛，至于档案，基本上没有利用”^②。最后，虽有多方支持，但因条件所限，资料编纂过程中仍有很多未能完成的事情。宓汝成在着手整理中国近代铁路史资料时，说 20 世纪 50 年代末只是“完成了设想的第一步”^③，成书内容上多有遗憾。“中国资本主义工商业史料丛刊”中，多本著作初稿亦在“文化大革命”前即已完成，但在政治运动的影响下，像《上海民族橡胶工业》《上海市棉布商业与〈中国近代面粉工业史〉》等多本著作，直到 1978 年后才得以修改出版。“帝国主义与中国海关”丛书第 1-3 辑、11、13 辑，有的因资料不齐，有的因其他原因，在 1966 年前一直未能出版。

总而言之，20 世纪五六十年代，经济史学家收集、整理和出版的 40 多种中国近代经济史资料，尽管带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它们“不断地进入国家行政部门，在那里成为规划祖国伟大社会主义建设地参考资料；又不断地进入高等院校，在那里成为广大青年的精神食粮”^④。这些资料不仅丰富了中国近代史的研究，同时对于研究当时经济问题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今日，仍为中国近代经济史研究的基础工具书，意义深远。

The Compilation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Materials in the 1950s—1960s and Its Significance

ZHANG Deng-de, SU Xue-me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250014, China)

Abstract: After the founding of New China, to support large-scale economic and cultural development as well as economic history research and education, the Chinese Academy of Economic Sciences, with cooperation from various state departments and institutions, led the collection, compilation, and publication of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materials. During the 1950s-60s, research teams overcame challenges to produce key works such as “the Reference Series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the Data Series on Modern Chinese Economic History”, and “Case Studies of Capitalist Enterprises in Shanghai”. These materials, highly valuable both academically and practically at the time, remain indispensable today, frequently cited by scholars worldwide. Their enduring significance continues to influence research decades later.

Keywords: 1950s-1960s; economic history archives; Institute of Economics;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责任编辑 山阳]

①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编：《永安纺织印染公司》，北京：科学出版社，2018 年，再版序言第 18 页。

②严中平等编：《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北京：科学出版社，2016 年，再版前言第 2 页。

③宓汝成编：《中华民国铁路史资料（1912—1949）》，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年，自序第 1 页。

④严中平：《编辑中国近代经济史参考资料工作的初步总结》，《经济研究》1956 年第 4 期。